

A Study on Mass Culture

From Aesthetic Criticism to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s

大众文化研究

从审美批评到价值观视野

主编 蒋述卓 陶东风

副主编 孙士聪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大众文化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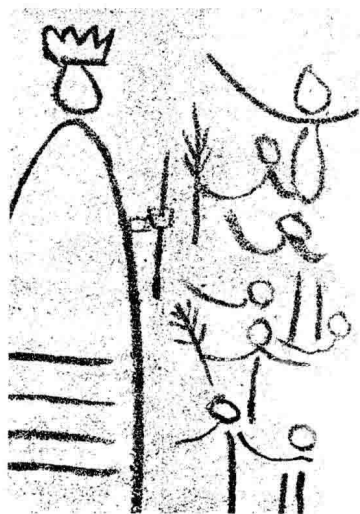
从审美批评到价值观视野

A Study on Mass Culture

From Aesthetic Criticism to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s

主 编 蒋述卓 陶东风

副主编 孙士聪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众文化研究：从审美批评到价值观视野/蒋述卓，陶东风主编；孙士聪副主编.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8

ISBN 978 - 7 - 5668 - 1563 - 7

I. ①大… II. ①蒋… ②陶… ③孙… III. ①群众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G24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4269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3. 25

字 数：226 千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8 月第 1 次

定 价：32. 5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蒋述卓

2014 年秋，我到北京京郊参加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召开的一次学术年会，会上与陶东风教授交谈，提出了两个课题组共同开一次小型学术会议的动议。因为他在 2011 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观研究”（项目号：11&ZD022），而我在 2012 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研究”（项目号：12AZW001），两项研究虽有范围的大小、宽窄之分，但研究目标与路向基本是一致的。两个课题组相继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也发表了一些成果。为了深化研究，促使两个课题组的成员在相互交流中进一步拓宽思路，完善课题，开一次会是非常必要的。2014 年底，这次 30 来人参加的小型学术会议就在暨南大学文学院文科楼二楼的小会议室内召开了。会议进行了两天，课题组成员相继发言，互相讨论，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观点上相互交流，形成了很好的学术氛围。会议的最终成果就是这本论文集。

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首先是从译介开始的，当时的学者在介绍后现代文化时就开始关注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随着大众文化理论的广泛介绍与研究，过去被称为“通俗文艺”或“通俗文化”的东西逐渐被“大众文化”所代替。20 世纪 90 年代，大众文化开始勃兴，并逐渐成为文化领域不可忽视的潮流。到 21 世纪之初，大众文化更为快速地发展，演变到目前甚至已到了“娱乐至死”的地步。人们对大众文化又爱又恨，感情颇为复杂——爱的是大众文化既给人们生产了娱乐，也生产了正能量；恨的是大众文化只生产娱乐，而不管生产什么意义，甚至还生产负能量。正因为如此，从价值观角度去研究大众文化应运而生。

此书中的多篇文章就提供了这种研究视角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它们分别从多个角度展示了大众文化研究的风采，有的文笔老辣，理论色彩极

浓，有的文笔虽稚嫩些，但也有敏锐的眼光和冲动的激情，然而，就总体而言，它们都能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勇于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评价与审视。这也正是这本论文集的特色所在吧。

大众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但如何摆脱西方的理论陷阱，扣紧中国问题，从中国问题入手，走好价值重构的道路，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一种尝试，但对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建设应该是有益的。

感谢陶东风研究团队给暨南大学研究团队带来了思想的启发，我们两个团队的初次合作是愉快与开心的。感谢暨南大学出版社对研讨会和论文集出版的支持。我在设想，若干年过去后，这次小型的会议和这本论文集将会成为我们团队合作的美好记忆，我也希望读到这本论文集的读者能记得，在大众文化研究的宏大森林中，曾有我们这东南北相连的鲜花。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于
羊城暨南园

导 论

陶东风

本书是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与暨南大学文艺学学科的一个合作成果，也是我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观研究”（项目编号：11&ZD022）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一、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的意义

今天，中国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产量最高、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化形态，它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经验，在塑造国民特别是普通大众的价值观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大众文化比其他文化形态（如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具有更明显的双重特性，它既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也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以及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战场。

基于上述考虑，大概没有人——不管他是大众文化的积极倡导者还是激进批判者——会否定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而如何与时俱进地结合研究对象的不断丰富，融合文艺学、美学、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建构具有阐释力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深入研究大众文化价值观，业已成为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重大课题。

价值观是世界观的核心，是人的价值态度和价值意向系统。价值观集中体现了人对生命价值、生活意义的理解，也是人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各种事物与现象做出是非、好坏、善恶、美丑等判断的根本依据。价值观对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价值观可以分为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与价值尺度、价值准则等方面。

大众文化在当代社会不仅是文化生产与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更成为人们获得知识、塑造人格、建构价值观的重要途径。由于大众文化具有其

他文化类型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可以说，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已经逐渐成为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及其变化的最集中体现者，以及大众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塑造者。优秀的大众文化固然离不开精良的制作技术，但从根本上说，价值观才是大众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对大众文化的价值观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是当下文化建设迫切而重要的课题。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大众文化生产者创作出更多高质量的、具有正确价值导向的作品，带给人们高层次的精神和文化享受。尽管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在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甚至从根本问题上暴露出价值观的严重混乱，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举例而言，几乎所有大众文化类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庸俗、低级、缺乏节制的性描写和色情描写；一些国产大片、网络游戏、网络小说存在严重的脱离道德底线、无度渲染和美化暴力甚至虐杀的倾向；以古装剧、官场小说、谍战片等为代表的一些大众文化，存在严重的宣扬权谋文化的倾向，对玩弄权术津津乐道，唯权力和地位是从；相当数量的广告、电视剧及其他大众文化类型，广泛存在炫富、崇富、拜金倾向，把理想生活等同于奢华生活，把成功人士等同于豪宅+美女+名车。诸如此类的价值误区已经并正在继续误导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大众文化存在的“三俗”问题已经引起广大群众的极大不满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严肃批评。

鉴于以上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现状及影响，我们认为，认真、严肃、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误区，用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引导大众文化的生产，使之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确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无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语境化地思考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大众文化价值观的研究是整个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追溯，最早对大众文化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当属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以社会批判为主要特色，其对象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众文化（如好莱坞电影），其主要理论观点可以概括为：意识形态控制论、商品化工业化生产论、作品贫困论、读者白痴论。这套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但存在严重的悲观主义和精英

主义倾向，大大低估了大众文化的复杂性，以及读者（接受者）的主动性、选择性和创造力，其对大众文化的价值几乎全盘否定，有简单化之嫌。而且，由于它的对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文化，因此与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大众文化的实际多有不符。

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分支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它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立场，拓展了对大众文化，包括大众文化价值观的认识。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伯明翰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斯图亚特·霍尔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引入大众文化研究，大大加深了对大众文化复杂性的认识。它不同于利维斯主义把大众文化看作是文化衰败的标志，也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文化看作是政治操纵的机器；不同于文化主义者把大众文化看作是“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文化，也不同于结构主义者把大众文化看作是强加于主体的结构效应。此后，费斯克等人发展出了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对的积极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的积极抵抗价值予以高度肯定，但矫枉过正的费斯克又陷入了廉价的乐观主义和民粹主义，对受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给予了过高的估计。

在国内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中，有两种价值取向或研究范式比较有代表性。一种主要受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影响，对大众文化的政治价值、道德价值与审美价值基本持否定态度，可称之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批判理论范式。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有学者认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显示了我国社会面临的精神乌托邦的幻灭，或用娱乐乌托邦取代精神乌托邦，大众沉溺于形象消费、感官刺激，而不再寻找深度的人生价值与意义。^①在1990年代中期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中，很多学者指责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历史意识和美学个性的追求。^②在有些批判者的文章中，大众文化甚至被指责为“旷野上的废墟”——不仅是文学的废墟而且是道德和文化的废墟。^③这些著作或论文都普遍援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并在这个单一思想资源的导引下思考和评价中国大众文化。这种价值取向在21世纪得到了延续，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所谓“新

① 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② 黄会林主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参见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左派”交汇的倾向。比如王晓明本来是1990年代中期“人文精神”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到了2000年，他在其主编的《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转向了对大众文化中的“新富人”“成功人士”形象及其奉行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批判，将之视作一种“新意识形态”，由此在很大程度上从“人文精神”的抽象道德批判和审美批判转向了颇具“新左派”色彩的阶级批判。

大陆批判理论存在的问题是对中国大众文化出现的特殊社会语境和政治文化功能缺乏本土化、历史化的研究视野和评价标准，机械套用西方批判理论的倾向比较明显。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初期大众文化在解构“文革”极左文化专制主义，推进文化的现代化、民主化、多元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多有忽视。^①从这个角度看，大陆大众文化研究的另一范式，即世俗精神范式或现代化理论范式，更多地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世俗化转型角度肯定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来弥补“人文精神”范式的不足。^②世俗精神范式的代表有李泽厚、王蒙等，他们主张从道德主义、审美主义或宗教价值的尺度完全否定大众文化是不可取的，理解与评价大众文化首先必须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视角，即立足于中国社会的世俗化、现代化转型，尤其是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历史教训，来肯定大众文化的祛魅、解神圣化（或曰推进世俗化）的积极意义。从此立场出发，他们对大众文化、对人的欲望、对文艺的消遣娱乐性等，也采取了肯定的态度，认为世俗精神以及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等都不是“人文精神”的对立面，“人文精神”的对立面是计划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极“左”意识形态。他们的论证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论色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大众文化与人文精神并不矛盾，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物质生活变化在精神生活

① 我曾经在多篇文中反思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著述普遍存在的机械套用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倾向，指出其未能对这个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有效性进行认真的质疑与反省。我强调的是：西方的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析范式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都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无不与中国的本土问题/本土经验存在程度不同的错位与脱节。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必将导致为了（西方）理论而牺牲（中国）经验的结果。参见陶东风：《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公共论丛》（第三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6～306页；《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兼论批评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东方文化》，2000年第5期；《批判理论的语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② 参见陶东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

中的反映。有论者指出：“我不同意把道德与文明同社会进步对立起来，把人的精神同人的社会生活（引按：指世俗生活）对立起来，把人文建设同经济改革对立起来，把文学同市场对立起来。”^①他以西方为例指出，“从历史的观点看”，人文主义（即人文精神）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物质生活变化在精神生活中的反映，而且它标志着世俗文化时代的到来”^②。李泽厚在谈到大众文化价值的时候说：“大众文化不考虑文化批判，唱卡拉OK的人根本不去考虑要改变什么东西，但这种态度却反而能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对正统体制、对政教合一的中心体制的有效的侵蚀和解构。”^③

显然，这些关于大众文化价值的判断立足于大众文化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治功能（而不是大众文化文本的美学质量），而不是立足于一种超验的、宗教性的终极价值尺度。这是它们不同于批判理论的基本特点，也是它们的合理性所在。因为如果我们不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运动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社会文化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伴生物——大众文化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史变迁角度看，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大众文化）具有消解一元的意识形态与一元的文化专制主义，推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意义。在这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语境的限定很重要。因为这个时候的大众文化正好出现于长期的思想禁锢松动之时，它本身就是作为对于这种思想禁锢的否定出现的。在中国当时的特殊语境中，它成为人性复苏的先声，繁荣了当时十分单调贫乏的文化生活。李泽厚在阐发其新启蒙思想时把新潮美术、朦胧诗和通俗歌曲都放在一起谈，认为它们都是新启蒙文化的标志，这是有道理的。的确，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消遣性、娱乐性的消费文化和商业文化，但是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中国人却从这消遣性、娱乐性的背后读出了更深刻的含义。

但是这种世俗化的价值取向也不是没有值得警惕的误区，这就是把世俗化和世俗精神本身抽象化、本质化，从而不能历史地、语境化地看待其

① 秦晋：《关注与超越》，《作家报》，1995年6月17日。

② 秦晋：《关注与超越》，《作家报》，1995年6月17日。

③ 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与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杂志》，1994年第5期。

作用。这里的关键是：中国的世俗化和大众文化本身就是在非常特殊的语境中出现的，而且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对此，我在20世纪90年代所著的文章中就有所涉及。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又进一步推进了这方面的思考并提出了两种世俗化的分析框架。^①我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类似西方的“祛魅”或曰世俗化运动（我称之为“第一次世俗化”）。这次世俗化否定了“文革”时期的伪集体主义、贫困崇拜与禁欲主义，肯定了物质生活和私人领域的合理性。但与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不同，这次以个性解放、人道主义以及物质生活的合法化为核心的世俗化浪潮并不意味着公共参与的衰退或公共领域的萎缩，恰恰相反，它构成了新公共性生成的基础。对于经历了“文革”的一代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听到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真是如沐春风，其震撼力、亲切感难以言表。而且这种感受具有深刻的公共性，它与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在精神上无疑是极为一致的。可以说，它通过自己的方式呼应、参与了思想界、理论界的新启蒙思潮。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世俗化开始发生畸变，开始向去公共化方向倾斜，到中后期开始愈演愈烈。中国社会虽然依然是一个世俗社会，然此世俗已非彼世俗。1990年以来的世俗是一种物质主义的世俗，是盛行身体美学与自恋文化的世俗。这种变态的物质主义与自恋人格不仅表现为对奢侈品的极度钟爱，对物质欲望、身体快感的无度追求，对个人内心隐秘经验的变态迷恋，它实际上还伴随公共性的衰落：对公共事物的冷漠、政治参与热情的衰退以及公共人际交往的萎缩。这第二种世俗是对第一种世俗的背叛。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1990年以来大众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语境，也使得后者失去了原有的政治批判性和颠覆性。

遗憾的是，有些站在世俗价值立场为大众文化辩护的人恰恰缺少对世俗化本身的历史分析和辩证分析能力。在发表于21世纪的文章中，仍然有人不加区分地认为，大众文化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间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体现了民主精神和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社会成长的伴生物，它开辟了自由交往的公共文化空间。文章对于中国大众文化的消极面几乎没有论述，特别是对于中国大众文化生存的不健全的体制

^① 参见陶东风：《畸变的世俗化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5期。

环境视而不见。^① 这里需要再次特别提醒的是，对于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包括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价值与意义的分析，必须紧密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因为这种价值与意义是不断被历史语境改写的，因此只有放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阐述清楚。

由以上分析可知，对于中国的世俗化与大众文化，必须充分考虑到它的方方面面，必须意识到自己所指的是什么时候的世俗化、哪种类型的世俗化，而不要用非历史、非语境化的化约主义方法把对象简单化，同时也把自己的价值立场简单化。

^① 金元浦：《重新审视大众文化》，《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期。

目 录

序	蒋述卓	1
---------	-----	---

导 论	陶东风	1
-----------	-----	---

大众文化理论的本土建构

从两种世俗化视角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陶东风	2
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初议	蒋述卓	22
新媒体情境中的“草根”粉丝文化生产 ——以“旭日阳刚”粉丝的文化实践为例	周兴杰	32
“新小资”文化领导权：表达主义及其寓言	孙士聪	42
时尚与大众：大众文化的时尚观	杨 光	58
美国宗教世俗化和中国文化世俗化	徐海龙	67
大众文化批评：从审美批判到价值观研究	陈国战	86

大众文化价值观批评

“怨恨电影”与失范的时代	周志强	98
暴力文化批判切忌简单化 ——从禁播《水浒》提案的争议谈起	贺玉高	110
都市生活剧的叙事伦理和价值观分析	袁文丽	126
浅析当下电视娱乐节目的价值特征	宋音希	135

网游小说：意义、叙事与价值表征	郑焕钊	沈雨前	146
主题设置与价值引领：广东微电影节初探	邹鹃薇		160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与日本大众文化价值观的比较研究			
——以当代中日动画电影长片为焦点的考察	冯学勤		166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产动画片的价值观问题	杜晓杰		186

大众文化理论的本土建构

从两种世俗化视角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陶东风

在理解和评价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时候，世俗化从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也常常围绕世俗化这个中心展开。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文精神论者与世俗精神论者围绕大众文化的评价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其分歧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世俗化。人文精神论者站在抽象的道德主义和审美主义立场把世俗化与大众消费文化斥为“旷野上的废墟”，是对精神文化（其实是精英文化）、人文精神（其实是文人精神）和终极关怀（其实是宗教超越）的腐蚀；而世俗精神论者（比如李泽厚和王蒙等）则把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理解为对“文革”极权主义与偶像崇拜的消解。但是两者都没有对世俗化本身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和逻辑辨析。

一、两种世俗化理论

由于韦伯社会学的支配性影响，我们通常只把世俗化简单理解为政教分离，即世俗政治领域和神圣宗教领域的分立自治，并把世俗社会等同于与“彼岸”相对的“此岸”（尘世），而没有对世俗社会做进一步的细分。通过对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阅读，我以为他们的著作中都包含或隐含了两种世俗化或两种世俗社会的思想，值得深入挖掘。

在《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以古希腊社会为例，对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进行了划分（这个划分是与阿伦特对劳动、工作、行动三种人类“积极生活”类型的划分联系和对应的）。私人领域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命活动领域，也是私人经验（既包括生理性感觉，比如疼痛；也包括私人之间的私密关系，比如爱情）的领域，在其中，物质关切与生命延续是支配性的。私人领域的根本特点就是缺乏公共性。而公共领域则以人工物品组成的世界为其物质形态，以平等、自由的交往（言行）为其实践形态（这种实践属于阿伦特所理解的“政治”），以超功利性为其价值形态。但无论

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就其相对于宗教超越领域而言，都属于世俗领域。相应地，世俗生活也就由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是世俗公共领域的活动，即言行（政治实践或政治生活）；另一个则是世俗私人领域的活动，即以劳动为核心的生命活动。在阿伦特看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在古希腊是非常清楚的，人们在私人领域满足自己生命的繁衍和私人经验的实践，在公共领域从事非功利化的以彰显自己的卓异性为根本目的的政治实践。前者是后者的条件。

世俗公共领域，大约相当于阿伦特所称的“世界”，特指既不同于宗教天国，又不同于私人领域（包括物质生活与私人经验）的人类活动舞台。阿伦特曾经反复说，“世界”的根本特征就是其公共性。世界是共同持有世界之人的世界，世界之所以是世界，就在于它被众人分享。^①如果处在一个公共世界健全的时代，人们会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呵护、珍爱公共世界；而在一个公共世界坏死、政治败坏的时代，人们除了遁入空门，皈依上帝，还可能沉迷于自己的私人生活，享受物质消费，或遁入个人内心世界，养成自恋人格，与他人隔绝。这两种情况都是逃离世界的方式，其实也是世界坏死的表征。

如上所述，阿伦特欣赏的世俗社会是古希腊城邦社会，其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存在明确界限，人们在私人领域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需要，过自己的私生活，与此同时，有一部分公民以自由人身份平等、自愿地参与城邦公共生活与政治实践。而且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公共领域的言行活动的地位要高于私人领域的生命活动。但到了中世纪和现代（阿伦特所谓“现代”特指17世纪以后到20世纪初期这段时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公共领域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骤减。公共领域或者被宗教领域取代（中世纪），或者被“社会”腐蚀（现代）。

在中世纪的政治黑暗时代，世俗领域中的公共部分（公共领域、公共生活）逐渐萎缩乃至彻底消失，被宗教团体，也就是“非世俗共同体”所取代。与此同时，世俗私人领域与世俗公共领域之间的联系被彻底斩断，人们离开私人领域后，不是进入世俗公共领域，而是“通过对彼岸世界的

①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第二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写道：“公共”的第一个含义是“可见、公开”，而第二个含义则“表示世界本身，就世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并且不同于我们在它里面拥有的私人处所而言”。（[美]阿伦特著，王寅丽译：《人的境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34页。）阿伦特说，世界是一个把人既联系起来又相互分开的公共空间，如同桌子。